

怀念可尊敬的老领导刘达同志

○王凤生（1964届水利）

今天，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100岁生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庆典。我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写一点文字，纪念它的光荣的一员，曾经的我的可尊敬的老领导刘达同志。

我和刘达同志的接触并不多，他一生对于国家、人民所作的诸多贡献，许多都不是我曾经与他共同经历的，甚至是我所不了解的。我与他的接触，已是在他近70高龄以后了，但即使在同他有限的接触中，就已经使我感受到了他的坦荡的心胸，实事求是的品格和朴实无华、永远居于群众之中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形象。陈云同志“书赠”他鲁迅的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既是

很高的也是恰如其分的对于他的评价。

刘达同志是1977年4月底来清华的，那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清华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是“重灾区”。他是受党中央之命来接管这个满目疮痍的乱摊子的。可以想见他当时面临的困难之大。

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路线盛行的当时，他要“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造成的，甚至包括涉及“文革”前清华的许多冤假错案，有的还是毛主席过问过的，谈何容易！

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一伙在清华策划了“反右倾复辟回潮”运动，把何东昌、艾知生等同志打成在教育界搞右倾复辟回潮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后来被称为“三个月运动”。刘达同志1977年4月29日进校次日，即找何东昌同志谈话，此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于5月12日，在主楼前广场召开的全校大会上，他宣布，1973年“四人帮”撤销何东昌同志的党委副书记职务“是不合法的”，即日恢复工作，从而为何东昌同志平了反。接着，又于1978年11月，为刘冰同志平反。“文革”后期，刘冰同志同



1984年2月，学校党委常委欢送林克同志去复旦大学任职。左起，第一排：韩凯、张光斗、何东昌、刘达、林克、艾知生、汪家镠，第二排：解沛基、何介人、张维、高景德、张绪潭、滕藤、李传信，第三排：饶慰慈、黄圣伦、吕森、张思敬、张慕萍、方惠坚、王凤生

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上书毛主席，状告迟群、谢静宜，反映他们的问题，后被毛主席批示为“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刘冰等同志因此受到批斗，“被专了政”。在那个年代，按照“两个凡是”的逻辑，对于毛主席批示了的事情，只能“坚决拥护”和努力“遵循”。但刘达同志本着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主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求得支持，最终将这个大的错案给翻了过来。1978年11月下旬，清华党委在大礼堂为刘冰同志召开平反大会。刘达同志宣读平反决定并讲话说：“刘冰等同志写信告迟群、谢静宜，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揭发的问题完全属实。说他们是诬告，不能成立，应予否定。强加给刘冰等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撤销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职务应予恢复。”此外，他还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要求依法惩处聂元梓、蒯大富等那些“四人帮”的小头目，使他们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刘达同志，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得失，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伟大品格。

1991年4月，为庆祝清华建校80周年，刘达同志以“清华大学名誉校长”的身份，著文《我与清华》，登载在《清华校友通讯》复23期上。文中写道：“由于‘文革’期间违背教育规律办学，清华的规模、布局及学科设置不尽合理，影响了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1978年我向邓小平同志做工作汇报时就反映了这些问题，并提出要从清华实际出发，对各方面进行调整。小平同志听后着重指出：‘办学要按

学校工作规律办事’。为此，在校党委领导下，学校开始了各方面的整顿工作。首先是调整学校的规模和布局，先后将绵阳分校、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团河农场、西山林场撤销，部分人员撤回本部。”

何东昌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情时写道：“刘达同志察觉这个问题以后，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并当即根据小平同志关于‘办学校要按教育规律办事’的精神，撤销了三门峡这个办学点，使分散的水利系能够集中起来，恢复元气，并根据钱宁教授的愿望，学校首先支持了泥沙实验室的建设。”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来谈谈撤销“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前前后后的若干具体情况，以及一些我所了解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刘达同志“拨乱反正”的决心和他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

1968年7月27日，工军宣队进驻清华后，搞开门办学。水利系结合专业，于1969年夏秋季开始，在河南三门峡建立办学基地，开门办学和参与治理黄河。至1969年8月16日，基地已有100多位教职工，除了水利系人员外，其中还有少量基础课教师。

197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长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大学而奋斗！》，将清华的经验概括为：“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

我于1972年10月由校务组回到水利系，根据系里安排，我于次年3月27日便去了三门峡基地。我在基地先后5年，前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参与《葛洲坝水

□ 怀念师友

利枢纽迺水变动区模型试验》的科研课题项目，担任“河工模型实验班”的教学任务和班主任工作。1977年至1978年，作为“基地”负责人，与全体师生员工一起，完成了“基地”撤回北京的任务，1978年7月，回到北京。“水利系三门峡基地”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中国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三门峡基地”同全国一样，开始了新的篇章。刘达同志1977年4月29日进校，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开始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审查迟群、谢静宜贯彻“四人帮”错误路线在清华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并逐一平反。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为了深入揭批“四人帮”，三门峡基地于1977年6月中旬，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组长：艾知生，副组长：王福义（工宣队员）、王凤生。艾知生同志在1973年的所谓“三个月运动”中，同何东昌同志一起受到批判，被“贬”到水利系教务科工作，1975年8月4日由水利系派到三门峡基地，当一名普通教师，教数学课，同其他教工一起住在一间大教室改成的集体宿舍内。

在刘达同志进清华仅两个月后的1977年6月27日，根据学校的安排，我和谢万波（北京旧市委派来的联络员）二人去北京向学校党委汇报三门峡基地的工作。7月4日上午，工字厅后厅的会议室里，坐了满满的一屋子人，只是听说这里边有校领导刘达、黄光、林克、田夫、来汉宣等同志，他们来听我们的汇报。除了水利系列席会议的几位是我熟悉的以外，其余全都是生面孔，不清楚谁是谁，刘达同志也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由我作汇报，汇报

中，有一位老同志常常插话，问问题，我想这位一定是刘达同志吧，其实不是，后来才知道那是田夫。那一次汇报会，刘达同志没有坐在一把手该坐的中间的位置，而是坐在北边靠西北角的一个位子上，自始至终很少提出问题要我回答，只是在那里认真地作记录。这就是我第一次同刘达同志面对面接触的情况。

1977年下半年和1978年，我们“领导小组”的主要精力便放在了落实校党委关于基地撤回北京这件事情上。关于三门峡基地的去留问题，我是赞成撤回北京的，在1977年3月我就向当时的系领导表达了我的意见。

1977年9月27日至10月20日，艾知生回北京总校。在北京期间他先后给我写了三封信，都谈到了基地去留的问题，这些信我至今都还保留着。在10月3日的信中，他写道：“关于基地问题我已找过何东昌，他说在刘达同志主持、老谢（万波）也在座的会议上，方针已经确定了。关于实行的步骤我已对他面谈，他也同意了（就是我多次对你讲的）。他要我们尽快写报告。我打算一见到老谢就商议，在京或回到基地写报告。知生 10.3”“今晚我又去找了何东昌同志，把你的信给他看了。知生又及 10.3晚”

10月9日信：“基地去向，听老谢讲，在刘达同志，还有田夫、何东昌参加的小会上，老谢汇报，决定了撤的方针。我找何东昌谈了几次，谈了我关于三步走，以及人员安排问题的原则意见，他都同意，要我们快写报告，老谢意见回到基地后，了解一些情况就写报告。”

根据学校党委的意见，艾知生同志从北京回到基地，我们就着手起草关于基地

撤回北京的报告。由我主笔，最终写成了《关于结束三门峡基地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

根据党委的要求，艾知生同志11月12日再次去北京总校，直到12月17日回到基地。

在他12月8日给我的信中说：“关于结束基地问题，上次张健同志（校党委领导成员，分管水利系）主持和系领导共同研究一次后，确定要给北京市委和河南省委写报告，要我代党委起草，本周我已将给北京市委的报告（讨论稿）并附件《申请迁京教职工及家属登记表》（21户，61人）交张健同志。目前正在党委领导同志中传阅，市人代会刚结束，刘达、老何刚回来，修改上报还要有一个过程。在此同时，学校正在准备房屋调整，我们已将房屋需要（家属及来京工作单身教工、学员）报校、系（看来户口问题可能会拖一个时期，也有可能有一部分教工先来京工作，同时解决户口问题，三门峡部分人留守）。”信中还谈了关于下一步基地领导班子的有关问题。

关于撤基地还有一段重要的信息转录如下。在由我负责代系党委起草1978年1月25日写给《清华大学党委并请转报水电



1988年5月，刘达同志（左）与王凤生谈话

部党组》的报告中写道：“校党委曾于11月29日报送教育部党组，并报邓副主席、方毅同志，在《关于清华大学今明两年招生的报告》（编号【77】清字第214号）中提出逐步撤回三门峡办学点的意见，已经华主席和几位副主席圈阅同意。”（文件批号“中办秘书处3129号，邓处993号，叶处3605号，教育部批示122号”）这说明撤基地这件事已经校党委上报至党中央，并得到最高领导的支持。

艾知生同志在1977年12月17日回到基地时，带回了学校党委的决定：

编号 【77】清发第26号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决定）

水利系党的领导小组、水利系三门峡基地运动领导小组：

经党委讨论决定：

1. 三门峡基地运动和各项工作由水利系党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2. 由基地运动领导小组代行原基地党总支职权；
3. 艾知生同志调回学校由王凤生同志任基地运动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

1977年12月28日下午4点，我和谢万波去三门峡火车站送艾知生同志，他回清华校本部，去受任新职，任清华“试化厂”（即200号，后来的核能所）党委书记。从此结束了他三门峡基地的工作。他为三门峡基地撤回北京作出了重要贡献。谢万波联络员于1978年1月20日返回北京，结束了他作为联络员在基地的工作。

自那以后，我和基地领导小组的同志

□ 怀念师友

便担负起了落实校党委关于撤回三门峡基地决定的组织实施工作。直到1978年7月3日，全部完成撤离基地的任务，我离峡返京，结束了我的200余天的三门峡基地“末代皇帝”的生涯，三门峡基地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撤销“基地”是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涉及人财物方方面面，涉及和清华校本部以及与三门峡地方上的关系，涉及与北京市、河南省的关系等。从1969年建立到1978年撤回，基地远离总校，独立运行了十年。基地使用的校舍是水电部11工程局（三门峡工程局）技校的校舍。由于教学、科研以及师生员工生活的需要，十年间又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建筑面积4531平方米（包括自建农场的建筑），还有从总校运来和在当地购置的许多器材、设备等资产。人员往来频繁，除了由北京总校去的教职工外，一些原两地分居的家属也调进了基地，还从当地招收了一批后勤人员。到撤离基地时，基地尚有教职工90人。

这其中物资问题的解决相对简单，校舍移交给三门峡工程局，一批物资适当作价移交给基地所处的原单位技校。自建农场移交给三门峡市，由市委农办、农业局接管。在全基地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从4月3日至7月1日，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将八个车皮的物资运回北京总校。

人员的安置是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基地有三个年级的共157名学生，需依据不同的教学进展情况做出不同的安排，有的回总校，有的不回北京，就地毕业。有的学生对于不让进京有意见，有的教工还表示支持，对此需要做教师学生的思想工作。

教工的情况更为复杂，90名教职工分

四种情况：1.家在北京，本人户口在京；2.家在三门峡市或附近地区；3.本人户口在京，家在外地，长期两地分居；4.一方户口在京，另一方户口在三门峡市的。

这里除了个别的因特殊原因，虽是本校教工，也不想回京而到其他省份、地区工作，需要个别做特殊处理的外，更难处理的是有21户61人进京户口的问题，以及在当地或附近地区招收的17名临时工的处理问题。解决进京户口的问题，如果没有刘达同志和校党委积极争取北京市委乃至党中央的大力支持，是很难办成功的。1978年2月我回北京总校，16日上午刘达和张健同志亲自听取我关于三门峡基地工作的汇报，刘达同志当时就打电话给北京市委督促解决三门峡回京教职工进京户口问题。最后做到了21户61人无一漏掉地全部进京，落北京户口。

就近安置人员的工作，在总校的支持下，我几次去郑州省委、洛阳地委，争取最理想的结果。就近安置的17人提出种种要求，有的也要求去北京。对于这些，除了做必要的思想工作，耐心说服之外，在具体安置方面，也做到了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最后做到，每个人自己提出想去的单位，河南省委发“红头文件”，附上每个人所去的具体单位，由三门峡市具体落实。就近安置人员的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将“水利系三门峡基地”撤回北京这个决策，在以刘达同志为首的清华校党委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就这样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落实。

刘达同志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始终保持“老八路”的亲民作风，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心里总是想着群众。1988年的夏

天，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俩在谈论工作之余，他主动和我谈到他做的一件事。每年3月，中央都要召开“两会”，届时代表们分住在北京的各大饭店，开全体会的那一天，所有代表要从各个饭店乘着各种车辆前往人大会堂，于是便实行交通管制。群众车辆为了给代表的车队让路，常常要在路口等很长时间。刘达同志，作为代表之一也在这个长长的车队中间，他觉得这样很不合适，就临时给胡启立同志递了个条子，说这样做不合适，不该让过路群众那样长时间地等我们。在路口，应该代表的车队过一段停一下，让群众过，代表的车再行，就这样彼此相互照顾一下。胡启立同志采纳了他的意见。从这样一件具体的事情上即可看出，刘达同志心里总是装着群众，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本色。

我的一位在台湾的舅舅，解放前在北平读书，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他跑去了台湾。多年失去联系。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他通过一位日本朋友联系上了我。并于1988年5月1日来大陆探寻亲人，一站就来到北京我这里，住了一段后便回阔别40余年的东北老家探亲访友，6月11日从东北返回北京。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刘达同志提出要请他吃饭，11日上午，刘达同志便找我商量此事，并派他的车送我去机场接我的舅舅。次日，12日下午，我陪刘达同志去郭沫若故居，参加郭沫若铜像揭幕仪式，参观郭沫若故居展览。参观结束后，刘达同志便同我一起顺路将住在城里的舅舅接回清华，并在甲所宴请他。饭桌上，舅舅说：“老学长（解放前二位都在北平读大学，刘达在辅仁大学，舅舅在北大），我可不可以提一个问题？”刘：

“可以呀，你说吧。”舅舅咬文嚼字地说：“共产党怎么可以‘走后门’！”是他此次去东北老家听到了一些有关“走后门”的事情，对此颇有看法。刘达同志说：“你批评得很对，共产党是不应该走后门的。我们反对走后门。”

舅舅在台湾不是什么重要的、“高级”的人物，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的中学教师，为什么刘达同志这样热情地招待他？我想，他是出于对从台湾来的人做工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这件事情的。由此可见刘达同志虽处高位，在小事上也能站在党的方针政策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处理事情。其工作的细致、考虑问题的周到令人钦佩。

1990年夏天，舅舅再一次由台湾来北京时，我陪他于6月11日专门去住在中央党校的刘达同志的家里拜访了他。

1991年我工作调动，去北京电影学院任党委书记。我仍然常常想起刘达同志给予我的教诲，怀念他对于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他没有到过电影学院，很想请他来查看。于是在我去了两年多以后的1993年5月，邀请他去北京电影学院，他欣然同意。5月27日，在清华党委办公室凌桂凤、关慧敏等同志的陪同下，刘达同志来到电影学院。那一次我没有把他作为大领导来接待他，什么汇报、视察、作指示之类的，通通免掉。而是请他完全以平民、长者、前辈的身份，走马观花地看看这所艺术院校。在我向他简要地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后，陪他去几个系、专业教室看了看，中午在学校食堂用了便餐后，他很愉快地离开电影学院返回清华。

刘达同志离开我们已27年有余，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这位可尊敬的我的老领导！

2021年7月13日